

#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特征研究\*<sup>1</sup>

胡娟<sup>1, 2</sup> 陈慕琳<sup>1</sup> 张艺琼<sup>1</sup> 龚芋交<sup>1</sup> 孔雅茹<sup>1</sup>

(1.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9;

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 中国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基于地理学视角, 利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 对湖北省 673 项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空间结构、时间演变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 即在石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明清时期发展兴盛, 而在商朝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元朝时期发展缓慢; 湖北省非遗十大类型的数量结构表现为四级, 整体空间分布为凝聚型, 呈现出“四团两带”的“人”字型空间结构, 鄂西南及鄂东南是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集区, 恩施、武汉、宜昌三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 湖北省国家级非遗呈现以武汉及周边地区和宜昌为核心的“双核”结构, 省级非遗则表现出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单核”结构。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传承; 传统手工艺; 戏剧与舞蹈; 民俗; 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7) 10 - 0206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10.02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sup>[1]</sup>。中国有着五千年绵延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 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近年来的全球化大背景, 给中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带来巨大冲击, 不仅非遗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迅速弱化、消失, 而且国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度也在急剧降低。如何挖掘非遗自身特色, 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活化”成为当前非遗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国外非遗研究起步较早, 除了对非遗的概念阐释、类型划分及保护措施等研究外<sup>[2-3]</sup>, 还重点挖掘非遗的价值, 侧重非遗利用及开发研究, 当前更扩展到非遗的传统、精神、情感、历史与社会等维度的研究<sup>[3-4]</sup>; 在非遗的开发研究上延伸到实践、代表、表达、知识和技能等社会因素。最近较多学者指出非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sup>[5-6]</sup>, 教育在非遗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 需要将这个观念传给后代人<sup>[5]</sup>, 因此非遗需要由特定的人群来传承, 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sup>[7]</sup>。自 2001 年我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后, 国内开始掀起非遗研究的热潮, 学界展开了对非遗的

<sup>1</sup> 收稿时间: 2017 - 03 - 22; 修回时间: 2017 - 07 - 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47);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161);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CNU16JCZX09)

**作者简介**: 胡娟(1979—), 女, 湖北黄冈人, 博士,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地理。E-mail: benhus@163.com。

概念内涵<sup>[8-9]</sup>、分类体系<sup>[10-13]</sup>和保护策略<sup>[14]</sup>等研究,在空间分布上发现非遗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规律,全国非遗呈带状、组团状分布,且区域分布不均,总体呈现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sup>[15]</sup>;非遗与区域自然、经济、民族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紧密相关<sup>[16-19]</sup>,并具有明显的平原指向性、河流指向性以及适宜气候指向性特征<sup>[16]</sup>;不同省份的非遗在空间上都表现出一定的集聚性特征,大多具有呈片、带、面的空间分布特征<sup>[17-19]</sup>。

非遗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产生、沉淀、保存下来的民族智慧与文明结晶,其产生受不同地域环境的影响,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直接相关,并具有地域性、传承性和社会性特征,会受到产生环境的区域特性及人们生产生活实践规律的深刻影响,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非遗往往具有一定内在关联性,并隐含一定的内在规律。通过一定区域范围内非遗的“时间—空间”研究,有助于提高对非遗空间分布规律的整体性认识,有利于探索区域范围内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

##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北,东邻安徽、西接重庆、北靠豫陕、南界湘赣,是古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南北、东西文化的融会之地。因西北有武当山脉和神农架、荆山、巫山,西南有大娄山和武陵山,东北为幕阜山、九宫山,因此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中南部为富饶的江汉平原,整体呈“口袋状”的西高东低地势特征。湖北省共有 17 个城市行政单元,本研究根据地形特征将全省分为鄂东北(黄冈、孝感和随州)、鄂东南(武汉、咸宁、鄂州和黄石)、鄂中南(天门、潜江、仙桃、荆门和荆州)、鄂西南(宜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鄂西北(十堰、襄阳及神农架林区)的五大片区,其中鄂西南、鄂西北也可统称为鄂西地区,鄂东北、鄂东南可统称为鄂东地区,鄂中南及鄂东南可合称为鄂中地区(图 1)。



图1 湖北省五大分区  
Fig.1 The five regions of Hubei Province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湖北省文化厅官网 (<http://www.hbwh.gov.cn/>)。截至 2017 年,湖北省分别于 2006、2008、2011、2014 年共颁布有 4 批国家级非遗,共计 103 项(127 个项目保护单位);于 2007、2009、2011、2013、2016 年分别共颁布有 5 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 351 项(546 个项目保护单位),因此湖北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有 454 项(673

个项目保护单位)。由于同一非遗项目往往所属多个地区,为更准确地研究湖北省非遗的地理分布特征,本研究按行政区划的不同以及该非遗的原生地,将同时分布于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进行拆分,将湖北省的 673 项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目前国际上对“非遗”的类型划分尚未做出统一标准,本研究主要根据 2008 年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分类标准,将非遗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sup>[20]</sup>。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将湖北省非遗的类型和级别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进行省域、区域、市域上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分析,再通过 ArcGIS 软件将其可视化表达,总结其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

### 1.2.1 非遗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湖北省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最近邻指数和核密度两项指标进行刻画。最近邻指数法是判断非遗点空间分布类型(均匀、随机、凝聚)的重要指标,它通过对比实际非遗点间的平均最近距离  $\bar{r}$  与理论随机 Poisson 分布下的平均距离  $\bar{r}_i$  的比值,得到最近邻比率 R:

$$R = \bar{r} / \bar{r}_i \quad (1)$$

当  $R < 1$  时,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聚类分布;若  $R = 1$ ,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分布;若  $R > 1$ ,则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趋向于离散或均匀分布。

另一方面,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非遗点的空间密度特征。核密度估计方法以每个非遗点要素为圆心,计算半径为  $h$  的单元圆内的密度值,得到非遗的空间连续密度变化过程。非遗点处的分布密度函数  $f(x)$  为<sup>[15]</sup>:

$$f_x(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2)$$

### 1.2.2 非遗点空间发展特征分析

湖北省非遗点的空间发展特征由标准差椭圆和加权平均中心两项指标进行描述。标准差椭圆用于表征非遗点空间分布方向,其计算原理为:以每个非遗点到总体非遗点算数平均中心的标准差为圆心坐标;以每个非遗点到总体非遗点算数平均中心的函数为旋转方向;以每个非遗点以及旋转方向的函数定长短轴,从而定义出能够表征非遗点分布方向的椭圆。

此外,以非遗的核密度值为权重,计算湖北省各个历史阶段非遗点的地理加权平均中心,并以此表征湖北省非遗的空间历史发展轨迹。

### 1.2.3 非遗点十大类型特征分析

洛伦兹曲线最初用于表征工业化的集中程度。本文在此运用洛伦兹曲线,表征湖北省非遗类型的集中化程度,集中化指数计算为:

$$I = \frac{A - K}{M - K} \quad (3)$$

式中：A 为非遗类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M 为完全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之和；K 为完全平均分布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I 即为集中化指数。

## 2 时间演变特征

湖北省历史悠久，本研究按照历史发展的文化特色将湖北发展大致划分为五大阶段：①原始文化形成期（距今 200 万年前—2070B.C.），人们对自然、鬼神的崇拜与敬畏构成该时期独特的原始文化特征；②楚文化发展期（2070B.C.—207B.C.），以春秋战国时期时鼎盛繁荣的楚文化为代表；③宗教文化兴盛期（202B.C.—960A.D.），此时佛教、道教在全国发展蓬勃兴盛，湖北境内以武当山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也在迅速发展；④经济文化曲折期（960A.D.—1644A.D.），因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态度的牵制，湖北经济文化在鼓励与压迫的双重作用下曲折发展；⑤文化蓬勃发展期（1644A.D.至今），主要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而使得革命和斗争成为此阶段湖北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湖北省五大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各有特点，而非遗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在文化引领的作用下，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文化面貌，因此随着经济文化的不同而各显内涵与特征（表 1，图 2）。

表 1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历史数量分布表

历史阶段	总数（占比）	国/省级 （项）	历史朝代	民间 文学	传统 音乐	传统 舞蹈	传统 戏剧	传统 曲艺	传统体育、游 艺和杂技	传统 美术	传统手 工技艺	传统 医药	民俗	
原始文化形 成期	51（7.60%）	11/40	石器时代	12	20	6	0	2	3	3	4	0	1	
			总数	12	20	6	0	2	3	3	4	0	1	
			夏朝	0	16	0	0	0	0	0	4	0	0	
			商朝	0	1	3	0	0	0	3	0	0	0	
楚文化形成 发展期	108（16.0%）	29/79	周朝	2	9	0	0	3	0	4	1	0	0	
			春秋战国	10	12	2	1	4	0	7	10	1	12	
			秦朝	1	2	0	0	0	0	0	0	0	0	
			总数	13	40	5	1	7	0	14	15	1	12	
			汉朝	19	6	4	1	1	0	8	9	1	2	
宗教文化发 展期	126（18.7%）	22/104	三国两晋	6	5	1	0	0	0	3	4	0	3	
			南北朝											
			隋唐	4	6	9	3	6	4	5	4	0	12	
			总数	29	17	14	4	7	4	16	17	1	17	

经济曲折发展期	116 (17.2%)	18/98	宋朝	5	1	5	1	4	9	3	4	1	1	
			元朝	0	1	1	0	0	0	0	0	0	0	2
			明朝	10	2	0	21	14	2	7	15	5	2	
			总数	15	4	6	22	18	11	10	19	6	5	
文化蓬勃发展期	251 (37.3%)	46/205	清朝	5	32	27	57	23	2	15	34	9	5	
			民国	2	0	3	3	1	1	0	9	2	0	
			新中国	4	0	0	0	1	1	0	10	4	1	
			总数	11	32	30	60	25	4	15	53	15	6	

注：沮水鸣音、海马、利川木雕等 21 项“非遗”由于现存资料过少，无法考证其生源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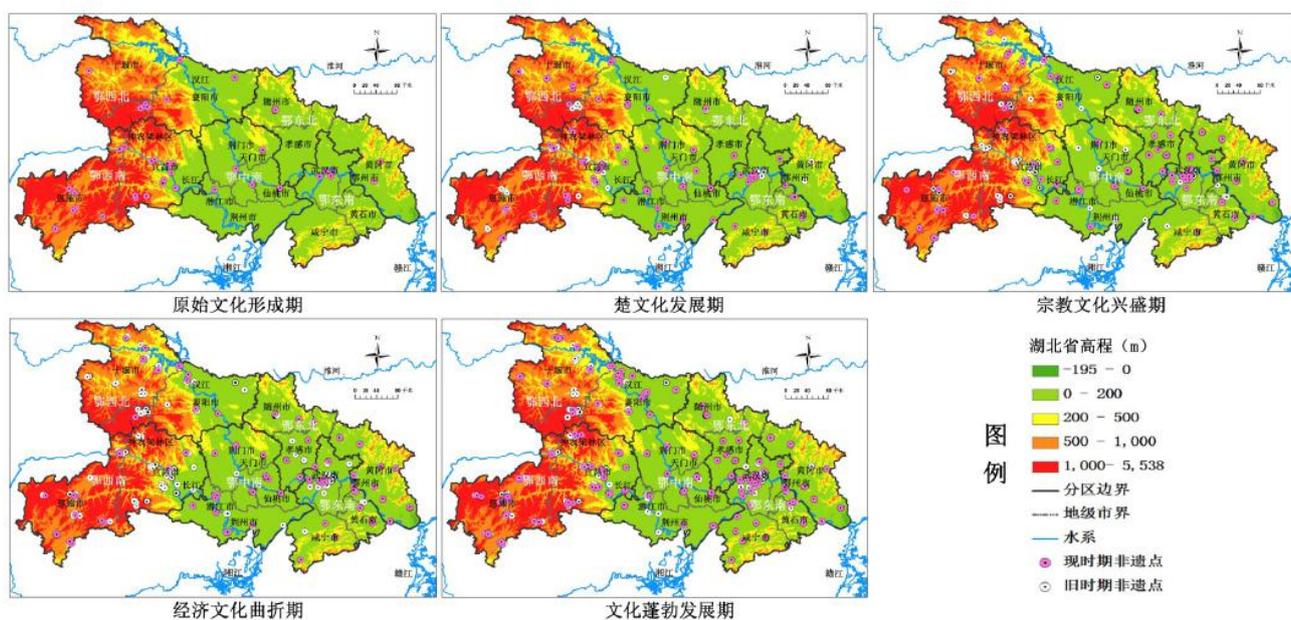


图 2 湖北省五大历史时期非遗分布图

Fig.2 The five historical period distributions of Hubei Provinc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2.1 历史分期演化特征

### 2.1.1 原始文化形成期：鄂西南“传统音乐”主导

原始文化形成期主要发展于石器时代。湖北境内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 51 项（国家级 11 项，省级 40 项），以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两类非遗为主，仅此两项占到总数的 62.7%；其次分别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非遗；民俗，曲艺两大类非遗数量极少，仅占该时期总数的 5.9%；尚未形成传统医药及传统戏剧类非遗。该时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中南和鄂西南的长江沿线，鄂西北、鄂东北和鄂东南地区分布较少。传统舞蹈与传统音乐类非遗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特征且多分布于鄂西南片区，传统音乐类非遗则多沿长江流域分布。

### 2.1.2 楚文化发展期：鄂西“传统音乐”突出

楚文化发展期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 1700 余年。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08 项（国家级 29 项，省级 79 项），其中传统音乐类非遗数量最多；其次分别是传统戏剧类，传统手工技艺类，传统美术类和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均在 10~20 个之间；曲艺类，民俗类，传统舞蹈类和传统医药类非遗数量较少，均在 10 项以下；尚无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该时期非遗空间上从鄂西南片区的宜昌沿长江至鄂东南的武汉。

该阶段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非遗数量最为突出，商朝与秦朝时数量最少，具体特征表现为：夏朝时期的非遗零散分布于鄂西片区，主要为传统音乐类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商朝时期，非遗数目较少，零散分布于恩施、宜昌、武汉等地；周朝时期非遗数目有所回升，集中分布于鄂中南及鄂东南的平原地区，且相较于夏朝，周朝非遗集中分布于鄂中南及鄂东南的平原地区，而不再是仅集中于鄂西片区，非遗类型主要为传统音乐；春秋战国时期，非遗数目达到该阶段内的最高值，高达 63 项，占该时期总数的 58.9%，湖北境内各个区均有分布，非遗类型集中于传统手工技艺，民俗，传统音乐和民间文学；秦朝由于历时较短，因此形成的非遗数目零星，并因受楚文化遗存的影响，秦朝时期的非遗都集中于楚文化氛围浓厚的鄂西南片区。

### 2.1.3 宗教文化兴盛期：鄂东“民间文学”崛起

宗教文化兴盛期历经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的四个阶段。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26 项（国家级 22 项，省级 104 项），其中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最多；民俗，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数目皆有较多增长，数量均在 10~20 项之间；曲艺，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数目增长较慢，均低于 10 项。该时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西南的南部和长江流域、鄂西北汉江流域以及鄂东北和鄂东南的平原地区，以武汉、恩施产出最多。

该阶段内各历史分期产生的非遗数量相对均匀：汉朝时共产生非遗 46 项，主要分布于武汉、宜昌、恩施地区，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居所有非遗类型之首，且远高于其他非遗类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新增非遗数相对较少，主要分布于鄂中南、鄂东北和鄂东南的平原地区，非遗类型以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以及传统手工技艺居多；隋唐时期产生的非遗数较多，空间分布上鄂东非遗有显著增长，非遗类型以民俗，传统舞蹈类为主。

### 2.1.4 经济文化曲折期：鄂东各项非遗出彩

经济文化曲折期主要经历了宋、元、明的三个朝代。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115 项（国家级 18 项，省级 97 项），其中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曲艺数量最多；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传统美术数量次之；传统舞蹈，传统医药，民俗，传统音乐数量较少。该时期非遗主要分布在鄂东及鄂中南片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片区最为集中。

该阶段内宋朝时期非遗主要分布于武汉及周边地区、鄂西北汉江流域。传统体育、游艺及杂技类非遗是宋朝时期数量最多的非遗类型，同时此类非遗数量也在宋朝达到最高，且以武当武术类非遗为主要部分，说明此时道教对湖北非遗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元朝非遗数量不多，仅有 4 项，均分布于黄冈与咸宁；明朝的非遗数量居历史第二，密集分布于鄂东南片区及恩施地区，数量最突出为传统戏剧类非遗，且自元朝以来，我国戏曲发展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受此影响，传统戏剧及曲艺类非遗成为明朝时期湖北省非遗的主要组成部分。

### 2.1.5 文化蓬勃发展期：鄂东南、鄂西南“传统手工技艺”丰富

湖北省发源于该时期的非遗共有 251 项（国家级 46 项，省级 206 项）。此阶段是五大历史分期中非遗数量最多的时期，并且传统戏剧类、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于该阶段内数量到达历史最高。从空间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武汉、宜昌、襄阳以及恩施。

该阶段内清朝非遗数量及类型表现最为突出。清朝是湖北省非遗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不仅数量异常突出，且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及传统舞蹈类非遗均在此时达到历史最大值；民国非遗主要分散于鄂东，数量不多，且类型不全，数量最多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缺少传统音乐，民俗，传统美术类非遗；与民国时期非遗数量特征相似，新中国非遗数量也不多，且同样类型不全，其中以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数量最多，缺少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类非遗。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非遗数量都较少，可能与这两个时期距今都不久的原因有关。

## 2.2 总体演化特征

从非遗数量看，湖北省非遗在历史时期的各朝代分布不均，起伏较大，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图3），即分别在石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和明清时期达到高峰，而在商朝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元朝时期为发展低谷。非遗的产生是历史沉淀的过程，朝代发展的长短、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等都是非遗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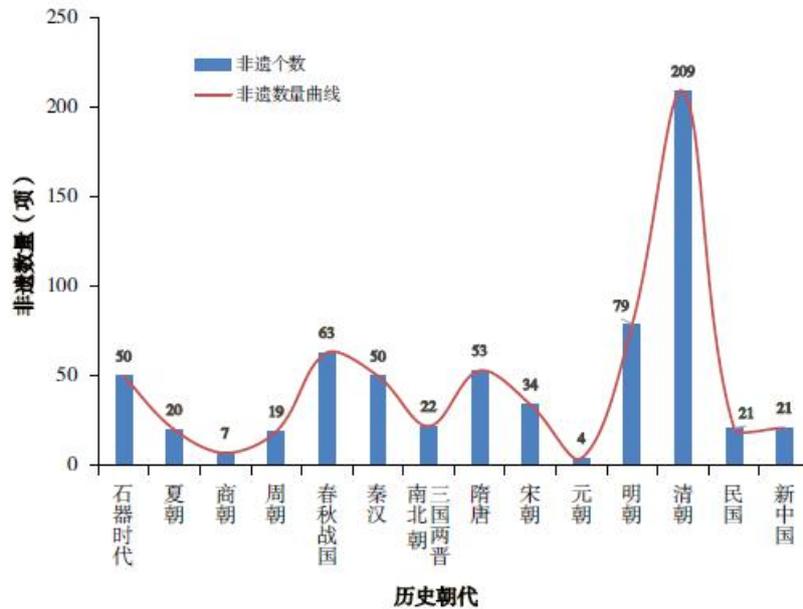


图3 湖北省非遗数量历史时期分布图

Fig.3 The historical period distribution of Hubei Provinc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原始文化时期内，石器时代是多项非遗特征的起源时间，由于当时人类文明开化程度不够，因此具有神秘、崇拜鬼神的特点的非遗多形成于此时期；楚文化发展期内，夏商周时期非遗数量较少，春秋战国时期却达到次级高峰，这与湖北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兴盛衰亡休戚相关，受楚文化的影响，该阶段内的非遗具有尚巫、浪漫的文化烙印；宗教文化时期内，动荡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非遗发展低迷，但在太平的秦汉与隋唐两大发展时期内非遗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且因当时道教与佛教的兴盛而发展出不少以宗教为文化主题的非遗；经济文化曲折发展期内，湖北的农业经济文化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态度的牵制，从而在经济文化在鼓励和压迫的双重作用下曲折发展，因此表现为非遗数量的大起与大落；文化蓬勃发展期内，一方面是由于距今时长较短，非遗遗存数量多，另一方面，该时期内经济、技术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造就了这一时期内各项非遗的飞跃发展，营造百花齐放的兴盛之态。

从非遗质心的各朝代空间演化过程看，湖北省非遗随历史发展呈现出“迂回向东”的移动趋势。首先，非遗的标准差椭圆长轴方向呈现明显纬向分布，预示着非遗东西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次，以秦汉非遗质心为界，秦汉之前，各时期非遗质心均分布于秦汉非遗质心西侧，秦汉之后，各时期非遗质心均分布于秦汉非遗质心东侧。其三，仔细观察各个朝代的非遗质心位置：石器时期与夏朝时期非遗质心位于鄂西南的宜昌；商朝、周朝、春秋战国、秦汉非遗质心分布在鄂中的荆门、天门、潜江交汇之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朝、明朝的非遗质心则相对偏东，质心分布于天门与孝感交界之间；而清朝非遗质心又重新回到荆门、天门、潜江交汇之处；发展至民国与现代，非遗质心再次东移至孝感、天门之间；元朝非遗质心相对特殊，位于咸宁境内。总体而言，即湖北省非遗的历史轨迹为“迂回向东”发展途径。

### 3 空间分布特征

#### 3.1 类型结构特征

湖北省非遗类型数量的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为 0.28，集中化指数偏低，类型分布呈现弱不均匀结构（图 5）。湖北省十大类型非遗的数量总体呈四级梯度阶梯分布：①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音乐的两类非遗数量比重最大，均大于 100 项；②传统戏剧类，民间文学类的两类非遗数量次之，属于 80~90 项的二级梯度区间；③传统美术类，传统舞蹈类，曲艺类和民俗类的这四大类型非遗数量依次都属于 40~70 项的区间内；④传统医药以及传统体育类、游艺与杂技类的这两类非遗数量相对较少，均少于 30 项。



图4 湖北省非遗加权平均中心分布图  
 Fig.4 Weighted mean center distribution of Hubei Provi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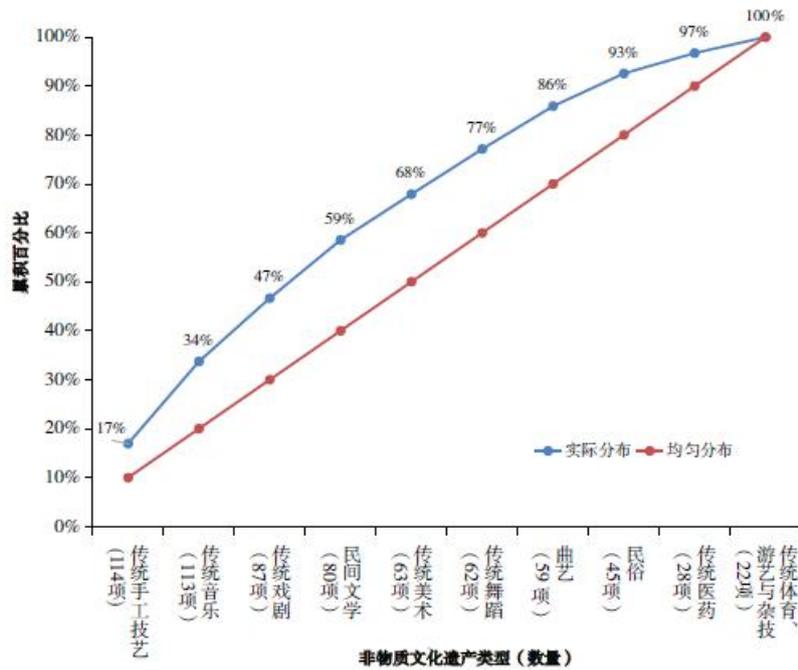


图5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洛伦兹曲线  
 Fig.5 Lorenz curve of Hubei Provinc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3.2 空间区域特征

#### 3.2.1 省域尺度

基于省域角度，通过最近邻指数法分析，得到湖北省非遗分布的最邻近比率  $R$  ( $R=0.17$ ) 小于 1，发现非遗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非遗的集中与分异情况，发现湖北省非遗呈现出“四团两带”的“人”字型空间结构（图 6），即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级团”，以宜昌为中心的“二级团”和以恩施为中心的“二级团”，以十堰—襄阳为中心的“三级团”；“两带”中沿长江、汉江的相夹区域分布的强南部带（宜昌、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鄂州、孝感一带），共分布 338 项非遗，沿鄂西山地一带分布的弱西部带（恩施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十堰、襄阳）则分布有 228 项非遗（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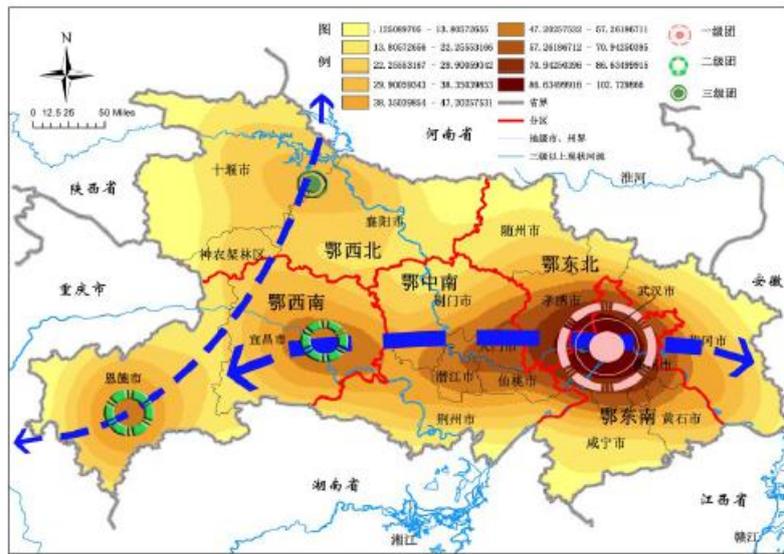


图6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Fig.6 Kernel densit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in Hubei Province

表2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地理数量分布情况

类型	区域	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	传统美术	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医药	民俗	国家/省级	总数(项)
鄂东南片区	武汉	14	4	4	9	10	4	10	20	10	4	16/73	89
	咸宁	4	3	1	4	0	0	4	5	3	0	4/20	24
	黄石	0	1	2	2	0	1	5	6	0	3	3/17	20
	鄂州	0	0	1	0	1	0	2	2	0	3	2/9	11
	总数	18	8	8	17	11	5	21	33	13	10	25/119	144
鄂东北片区	黄冈	10	5	3	12	2	6	5	9	2	5	10/49	59
	孝感	7	0	7	6	4	0	5	7	0	1	6/31	37
	随州	3	1	0	3	2	0	0	5	1	2	3/14	17
总数	20	6	10	21	8	6	10	21	3	8	19/94	113	
鄂中南片区	荆州	5	6	4	5	11	0	4	10	1	3	10/39	49
	荆门	1	5	0	5	1	1	0	5	4	1	1/22	23
	潜江	0	4	3	4	1	1	4	3	0	1	4/17	21
	天门	2	3	0	2	4	1	3	4	0	0	2/17	19
	总数	8	16	7	16	20	3	11	22	5	5	17/73	126

	仙桃	0	1	0	3	3	1	5	3	0	0	3/13	16
	总数	8	19	7	19	20	4	16	25	5	5	20/108	128
鄂西南 片区	恩施	3	19	21	14	10	1	6	15	1	4	17/77	94
	宜昌	15	36	8	4	5	0	1	8	1	9	26/61	87
	总数	18	55	29	18	15	1	7	23	2	13	43/138	181
	十堰	8	9	5	8	2	5	3	7	2	8	11/46	57
鄂西北 片区	襄阳	3	12	3	4	3	1	5	5	3	0	8/31	39
	神农架	5	2	0	2	0	0	1	0	0	1	2/9	11
	总数	16	23	8	14	5	6	9	12	5	9	21/86	107

### 3.2.2 区域尺度

从区域尺度看，湖北省非遗表现为东西密，中间疏的特点，其中又以鄂西南（181项）及鄂东南（144项）分布最为集中，但是两片区域的密集特点各有不同：鄂东南片的非遗数量多，类型丰富，空间核密度大，分布密集；鄂西南片的非遗数量虽然多于鄂东南片，但非遗分布相对分散，空间分布核密度小于鄂东南片区，非遗类型也不如鄂东南片区丰富，相对单一集中，多为传统音乐及传统舞蹈类非遗。非遗的这种空间分布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原地区的促进融合作用以及山地丘陵地区的保护作用；鄂东南片地处江汉平原地区，自古以来便利、鱼水发达的先天条件使得作为人类活动文化成果的非遗丰富多彩；而鄂西南片地处鄂西山地，山地丘陵的屏障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之间的交流，致使非遗类型相对单一，密度也较小。

### 3.2.3 市域尺度

湖北省17个城市行政单元中，非遗以恩施自治州（94项）、武汉（89项）、宜昌（87项）数量最多，总体呈现四级结构：①恩施、武汉、宜昌的三个城市属一级，非遗总数均超过85项。②黄冈、十堰、荆州的三个城市为二级，非遗总数大致在50~60项的区间内。③襄阳与孝感的两个城市为三级，其非遗总数均在30~40项的区间内。④咸宁、荆门、潜江、黄石、天门、随州、仙桃、神农架、鄂州的9个城市属于四级，其非遗数量均低于30项。

非遗类型的集中程度上，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均是以武汉核心点的鄂东南片区为其分布中心；传统音乐类非遗以宜昌为一级中心、传统舞蹈类非遗则以恩施为一级中心，孝感为二级中心；民间文学、民俗类非遗各以武汉、宜昌为其分布中心；曲艺类非遗则明显具有沿长江分布的特征。

## 3.3 级别空间特征

湖北省国家级非遗共计127项，宜昌市非遗项数量最多（25项）。国家级非遗整体呈凝聚型分布，表现为“双核”结构，即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核心的一级核心和以宜昌为核心的二级核心（图7），主要集中于传统音乐、传统戏剧及民间文学的三大类型非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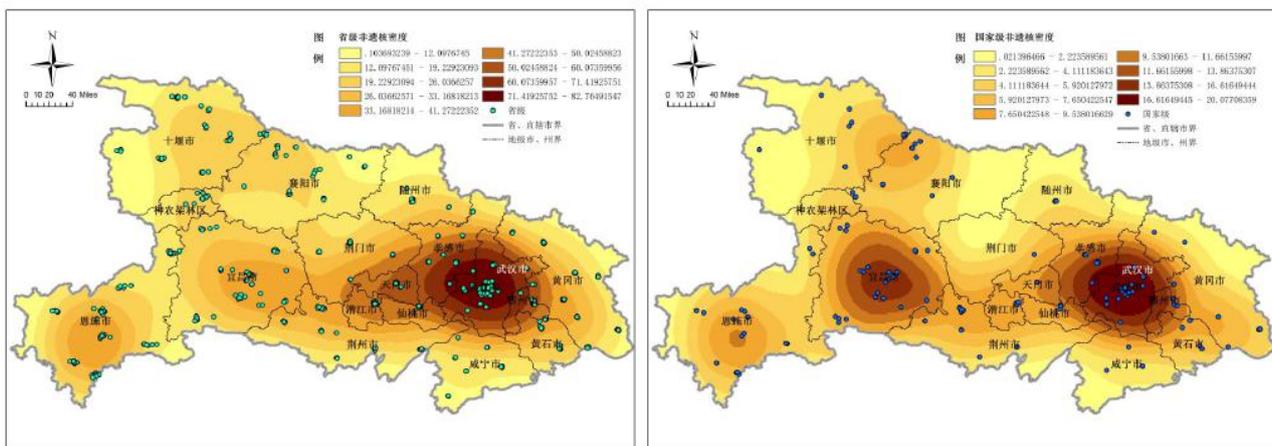


图7 湖北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Fig.7 Kernel density of the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in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级非遗共计 546 项，以恩施（78 项）、武汉（73 项）产生的非遗项数量最多。省级非遗的空间分布类型同样为凝聚型，表现出以“武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单核”结构，以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与民间文学的三类为主。

## 4 结论与展望

### 4.1 主要结论

本文对湖北省 673 项国家级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空间结构、时间演变及其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结果表明：

湖北省非遗类型的数量结构分布不均匀，属于集中分布，但集中化指数偏低，呈四级梯度分布：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音乐类非遗数量比重最大，传统戏剧、民间文学类非遗数量次之，传统美术、传统舞蹈、曲艺、民俗类非遗数量位居第三阶梯，传统医药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数量最少。

第二，湖北省非遗历史发展过程总体呈现“四峰三谷”的变化特点，周朝时期之前，非遗集中于鄂西南片区；春秋战国时期，非遗中心与楚文化中心的宜昌、荆州相吻合，且逐渐表现出东移的特征；发展至最为鼎盛的明清时期，襄阳及十堰、恩施及宜昌、孝感及黄冈、武汉及咸宁均是非遗的集中地。由此在空间上形成以武汉“一级团”，宜昌、恩施、十堰—襄阳为“二级团”，以及沿长江的强南部带和沿鄂西山地的弱西部带的“四团两带”人字型空间结构。

第三，湖北省非遗主要集中分布于鄂西南、鄂东南两片区域，但这两片区域的集中特点不尽相同：鄂东南片非遗数量多，类型丰富，分布密集；鄂西南非遗数量不少，但类型较单一，主要为传统音乐类和传统舞蹈类非遗，空间分布相对分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原地区的促进融合作用以及山地丘陵地区的保护作用。

### 4.2 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湖北省非遗具备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无论是非遗整体，或是各类非遗，都表现出时空分布不均的特征。从空间视角出发，针对区域内非遗实施具有的保护措施，不仅有利于非遗的原地活化，还可避免盲从，浪费资源。

充分利用“四团两带”人字形空间特征，发挥“点轴”作用，实现原地保护。研究显示湖北省非遗“点轴”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因此整体空间保护策略可以将非遗集聚的“四团”作为发力点，“两轴”作为路线，充分利用长江的水路贯穿之便以及鄂西山地的界面保护效应，向湖北省其他区域辐射非遗文化。

首先于武汉重点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研活化中心，集中政府、社会以及学术力量，服务整个湖北省非遗项目；其次于鄂西南设立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包括宜昌、恩施州两大行政区，以保护具有明显少数民族特征的非遗项目；最后分别于襄阳、荆州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所，各自在南部长江带以及西部鄂西山地带承担恩施、宜昌与武汉之间的枢纽作用。

非遗南部长江带重发展，西部鄂西山地带重发掘。南部带可利用长江主轴贯穿武汉至荆州、宜昌、恩施一带，串联非遗文化，形成非遗文化带，促进宣传发展；而非遗西部带可利用鄂西山地的天然阻隔，强化保护性发展，进一步发掘出尚未被列入保护名单的非遗项目。

#### 4.3 结语

非遗的时空分布特征是非遗研究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工作，对探索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时间—空间”为研究对象，从横向、纵向的双向维度对湖北省非遗进行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从整体角度认识和把握非遗，从而有利于非遗的文化特征、文化属性的归纳与分析，更有利于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另外，非遗的空间分布研究依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内容，下一步，本研究将进一步从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两大类分析非遗时空分布与湖北省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探究非遗折射当地历史文化发展方面的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G]. 2005 - 03 - 26.
- [2] Munjeri D.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from difference to convergence [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4, 56(1-2): 12 - 20.
- [3] Munjeri D. The reunification of a national symbol [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9, 61(1): 12 - 21.
- [4] Bordignon M, Corsi L, De Gasperis D, et al.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 global responsibility. Sichuan towers case study [J].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2009, 16(2): 379 - 387.
- [5] Yalçinkaya E. Creative Drama Study abou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urkish Wedding Traditions [J]. *Creative Education*, 2015, 6(1): 22 - 31.
- [6] Yu Park H. 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 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520 - 539.
- [7] Cominelli F, Greffe X.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for creativity [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2, 3(4): 245 - 250.
- [8] 张春丽, 李星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研究述论 [J]. *中华文化论坛*, 2007(2): 137 - 140.

- 
- [9] 刘壮, 牟延林.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 [J]. 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34(5): 183 - 187.
- [10] 向云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M].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 [11] 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12] 周耀林, 王咏梅, 戴昉.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方法的重构 [J]. 江汉学术, 2012, 31(2): 30 - 36.
- [13] 张敏.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 [14] 苑利. 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 [J]. 中华手工, 2014(4): 96 - 97.
- [15] 程乾, 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地理科学, 2013, 33(10): 1 166 - 1 172.
- [16] 吴清, 李细归, 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 [J]. 经济地理, 2015, 35(6): 175 - 183.
- [17] 李蕊蕊, 赵伟, 陈静.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 97 - 102.
- [18] 袁少雄, 陈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 [J]. 热带地理, 2012, 32(1): 94 - 97.
- [19] 柴国珍, 孙文学.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与重心移动分析 [J]. 文化遗产, 2010(2): 6 - 11.
- [20]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M]. 北京: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